

# 世纪讲坛

復旦大學出版社

# 目 录

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哲学与人文

## 失去了的思想维度

俞吾金 3

## 走近世纪巴金——巴金与 20 世纪中国读者

辜也平 28

## 财富的归宿——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资中筠 48

## 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

梁从诫 60

## 城市精神与建筑文化

常 青 69

## 抹不去的记忆——中国历史城镇及其保护

阮仪三 78

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

## 与时俱进的中美关系

倪世雄 101

## 剖析美利坚——美国、美国人以及美国的国家政策

孙 哲 122

反恐形势与大国关系

冯绍雷 145

环视中东——中东热

朱威烈 158

宪法与公民

殷啸虎 178

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教育与科学

理想、立志、成才

杨福家 201

学做人师

于漪 213

托起明天的太阳——谈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于海 杨雄 乐善耀 234

21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我的诺贝尔成长之路

艾哈迈德·泽维尔 249

能源的现状与利用

翁史烈 257

探索脑的奥秘

杨雄里 267

人类怎样认识宇宙

赵君亮 283

地下空间与未来城市

束昱 304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斯蒂格利茨 325

中国经济增长今昔谈

林毅夫 336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吴敬琏 350

循环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吴季松 367

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精神

鲍罗·汤克尼古拉斯 379

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

孙健敏教授 392

# 序言

张德明

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主导的今天，这一句名言有了新的诠释，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同等重要，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幸福。十多年来，上海教育电视台正是将知识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使命，自比“绿叶”，甘作“绿叶”，使“知识走向大众”之花长盛不败，为人们送去精神健康的清新之风，撒播享有知识的人间幸福。2002年，教育台推出了大型知识类演讲栏目“世纪讲坛”，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追求和创新，该栏目已经成为广为观众喜爱的电视品牌，成为市民感受科技进步、获取最新知识的重要窗口，成为上海建设精神文明和学习型社会的靓丽风景。

上海，是一个激情燃烧、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在这里，高校林立，名家荟萃，人才辈出，创新活跃，吐故纳新，集聚了无与伦比的优质教育资源。上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将和谐社会建设推进到了新阶段，通过积极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上海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广大市民的学习需求日益强烈。多年来，“世纪讲坛”通过不懈努力，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依托、以科学人文普及为主体、以社会生活热点话题为先导”的节目风格。“世纪讲坛”以沪上知名专家学者为嘉宾主体，充分凸现海派学者的风范。从选题到访谈，栏目组全体同仁全力以赴，力图将“象牙塔”里学者、专家的学术知识生动、形象而鲜活地传播给大众。“世纪讲坛”得到了众多知名专家、

学者的鼎力相助,他们积极为“世纪讲坛”献计献策,为栏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到2005年4月,“世纪讲坛”已经开办三年,共播出一百五十多期节目,先后有一百五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登上“世纪讲坛”,讲演内容是人们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科学和经济等广泛领域,收看“世纪讲坛”的电视观众累计达上千万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大中学生、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离退休干部。2004年,中科院杨福家院士的《理想、立志、成才》、中国工程院翁史烈院士的《能源的现状与利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科院资中筠研究员的《财富的归宿——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同济大学常青教授的《城市精神与建筑文化》、上海市特级教师于漪老师的《学做人师》等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与强烈反响,不少讲座还被一些报刊全文转载。

在教育电视台这片“绿叶”的衬托下,“世纪讲坛”栏目走出了一条促进知识公共化的特色之路。“世纪讲坛”在网上开设了视频点播系统,节目的录像带、VCD及电视播映权的发行情况一直良好。尽管还只是一个新的小生命,但她满足了人们对富有思想性、学术性的电视栏目的需求。目前,“世纪讲坛”栏目还开展了“走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挖掘孕育在上海高校中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世纪讲坛”正在发挥着传播科学知识、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上海地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把“世纪讲坛”栏目定为宣传“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指定电视平台。上海市委老干部局每个月都要把节目排片制成节目单,发给全市三万五千多名离退休老干部,组织收看。“世纪讲坛”在大学生中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积极参与节目制作,每次参与都成为他们接触名家的珍贵机会。

电波可以穿越地域,而文字可以经久传阅。应广大学习者的要求,我们将学者、专家的思想用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以便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一“知识盛宴”。2003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出版了《世纪讲坛》第一辑,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心,大量读者期盼新的专辑出版。今天,我们精选了2004年“世纪讲坛”的部分访谈和演讲编辑成册,内容涉及教育、环境、能源和反恐等热点问题、循环经济等难点问题,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奉献给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内,“世纪讲坛”得到了复旦大学杨雄里院士和倪

世雄教授、华东政法学院殷啸虎教授等知名专家的关心，这种关心也是本书能够得以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面对时代的挑战，“世纪讲坛”将锲而不舍，继续以弘扬知识、促进知识共享为己任，充分利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智囊库”，坚持为市民提供最前沿的、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名家讲座，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出发为上海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城市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文作者为上海教育电视台台长、教授）



世纪讲坛之：

# 哲学与人文

# 失去的思想维度

俞吾金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大家来到世纪讲坛。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俞吾金教授，欢迎俞教授。

俞教授，自从1977年您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以后，可以说从那时候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您一直在研究哲学方面的一些课题，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我们常人的眼中，哲学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可能是比较枯燥，比较乏味，甚至是有些深奥，我们一般人搞不懂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走上了学习哲学这样一条道路。

俞吾金：我原来在中学读书期间对哲学就有点兴趣，但是还谈不上一定要去学习或者研究哲学。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实际填了四个志愿，全部都是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志愿是新闻，第二个是中文，第三个是哲学，第四个是历史。我在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复旦，其他学校都不去。

主持人：复旦是您整体的选择，但是好像哲学没有放到你的主选位置，放在备选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俞吾金：因为当时我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以后（正好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有十年时间在工厂里劳动，就是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劳动。我已经带学徒了，也就是说，成了师傅。前五年我主要是做安装工人，后五年调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

的宣传处工作。

主持人：做宣传干事，对吗？

俞吾金：对，做那个工作。然后我也兼摄影的工作、写作的工作。这样一来，我对新闻、中文都有兴趣。我也写过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所以我在考复旦的时候就把新闻和中文放在前面。当时因为文科没有其他系可填，所以我把哲学也放在那边，我对哲学多多少少还有些兴趣。

主持人：那后来怎么就学了哲学了呢？

俞吾金：在“文革”以后，我作为77级学生是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我们考四门课，我的总成绩是三百二十多分，应该说也算高了。因为当时那一届的录取比例是四十个人中录取一个人，四十比一。但是我和其他同学比较，我的考分比他们略低，所以更高分的人就进入了新闻系和中文系，我就掉到第三个志愿——哲学系。

主持人：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不过从您的身上我们也能感觉到，分数和能力好像有的时候不是成正比的。

俞吾金：刚才您讲到的哲学很深奥，它确实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我记得古代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研究哲学就像在沙漠中间跋涉。

主持人：在沙漠中间跋涉，非常艰难。

俞吾金：往前走，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黄沙，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片绿洲，那个时候的心情就会非常快乐。所以古希腊有个学者说过，如果我能解答一个问题，找到它的原因，比让我做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这表明，哲学家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信念和激情。

主持人：我相信你也是按照这些学者所指出的路来继续走您自己的道路的。

俞吾金：对。我记得马克思也说过，研究哲学要有普罗米修斯的献身精神，所以我觉得，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同路人，而是真正能够有志于它，能够潜心进行研究的真理的追求者和崇拜者。

主持人：在我们一般人的眼中，我们觉得哲学家的生活可能就是为真理和自由而献身的这样一个过程，您也曾感叹过这个世界为抽象思维而奋斗的人越来越少。那么我很想冒昧地问一句，您觉得自己是否有一种“是这个时代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这样的感觉？

俞吾金：这个恐怕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人类存在，不管是过

去的时代，现在的时代，还是将来的时代，理想主义和理想永远有存在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想不到的事情，他就做不到。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出国的愿望，他就不可能去办出国的手续，也不可能去攻读外语。他总是先有目的，后有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永远是有理想的。如果他不受理想支配的话，那他的生活就可能和动物差不多了。或者如同我们在通常生活智慧中所讲的，就像吃萝卜一样，洗一段吃一段。但是人生应该是有理想、有远见、有追求的。

主持人：1993年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面，姜丰、蒋昌建等复旦学子脱颖而出。我记得当时您是辩论队的教练兼领队，后来您还和其他人一起合编了《狮城舌战》。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看到过这本书。您对辩论研究肯定有自己的见地，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大家简单地说一说，让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

俞吾金：好的。在新加坡辩论以后，我在很多大学做过有关辩论艺术的讲座，可能要三个小时左右。所以，我在这里只能说最最简要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辩论不是说马上确定题目，当场就辩论起来。这样的话，没有知识的积累和含量。所以辩论要辩得好的话，就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然后才可能临场发挥得比较好。

主持人：前期的准备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俞吾金：非常重要。不能把辩论理解为单纯技巧的东西，好像我用什么技巧不让你说话，或者我理解你的思想，或者诸如此类的方式来赢得胜利。我觉得，辩论的真正胜利还是要靠自身的知识积累，还有你对辩题的原创性的理解。另外我觉得辩论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临场应变。我记得，当时我们和台湾大学在决赛的时候，辩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台湾大学的观点是“人性本善”，我们的观点是“人性本恶”。当时，台湾大学的队员讲，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人都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时，我们有个队员马上就站起来说：“请问对方辩友，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因为要放下，就先要拿起来。是什么动机促使你拿起屠刀，如果你的人性是善的话？”

主持人：这个回答真的非常棒。

俞吾金：所以对方无言以对，台下的观众马上鼓掌。辩论结束以后，我还跟那个队员开玩笑，我说：“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束，你可以再问第二个问题：如

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因为它先得生产出来,才有可能被拿起来。”我又说,“还可以再问第三个问题: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因为要生产,先得设计。”所以,对方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也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回答。

主持人:一定是这样,因为到现在我连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想非常敏捷的思维和平常日积月累的知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俞吾金:当然还要加上辩论当中的一些特有的技巧才能够使辩论赛完满地完成。

主持人:今天您演讲的题目就是《失去了的思想维度》。我记得您在《解放日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实用理性与价值理性,和您今天演讲的内容也有一定的联系,在目前技术知识、实用与实惠的观念占上风的环境下,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理念对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义,今天要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话题。来,我们继续用掌声欢迎俞教授,为我们开始今天的精彩演讲。

## 演讲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失去了的思想维度”。我的这个讲座的目的是通过对当前中国学术文化界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来倡导思想。所谓思想,就是独立地、原创性地进行思考。所以我这个讲座一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浮躁的心态”;第二个部分,叫“模仿的时代”;第三个部分,叫“无根的观念”;第四个部分,叫“重建思想的基础”。

下面我来讲第一个问题——“浮躁的心态”。平心而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文化界在主观上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些努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全国的学术出版物和刊物越来越多,它们的装帧也越来越漂亮,版面也在不断地扩大。比如说,我们翻译进来的文史哲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著作和论文的数量也在不断地膨胀。但是如果从客观上看,就会发现,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当代学术

文化界提供出来的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文化作品和理论作品——可以说寥若晨星，很难见到；另外一个方面，真正具有深厚学养的中青年学者，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甚至可以说非常少。相反，我们在当前社会中能够感受到的，是普遍存在着的浮躁心态，就像贾平凹的小说《浮躁》，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思考的对象。尤其是经常见诸于大众传媒的提法，所谓“零的突破”，所谓“跨越式的发展”，所谓“世界一流”等等，这样的说法到处可见，我把它称之为“修辞学的转向”或者“修辞学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达方法，改变了他们描述世界的语言，但是世界本身没有任何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是我们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发生了变化，但是世界本身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

我下面讲四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人们嘴上总是挂着“原创性”、“思想性”、“创新”这样的术语，但实际上却掩盖了他们思想的贫乏乃至缺陷。我们在不少地方，在不少论著中看到是“正确的废话”和“隐性的抄袭”。什么叫“正确的废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那么这句话永远正确，但是这句话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量。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对的，所以它就不能提供任何信息量，也就是说，它的信息等于零。所以，“正确的废话”就是它永远正确，但是它没有信息量。所谓“隐性的抄袭”是相对于显性的抄袭而言的。显性的抄袭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写文章、写著作，剽窃抄袭其他人的著作或者论文。而隐性的抄袭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抄自何方，他的整个文本也许一部分是从网上下载的，一部分是从他人的论文中借过来几个句子，一部分是从哪部以前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把它们编织起来，就像一个女孩织毛衣一样，所谓“能指的编织”，把它们编织成一篇文章、一本书，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称之为自己的作品。

第二种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人们把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者》——就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托着下巴在沉思——的图片到处挪用和张贴，要造成一个人们好像在思考，人们好像在沉思的这么一种外观和假象。实际上恰恰表明人们不在思考。人们只是装出样子好像在思考，实际上是在逃避思考。在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因素的引导下，人们的理性正在蜕变成计算理性，除了赚钱，就是 make money。除了计算和算计，人们还在思考什么问题呢？计算技术、计算的数量正在决定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

面。看一个学生是否优秀,主要看他的考分,他是多少成绩;看一个企业家是否是优秀企业家,主要看他每年上缴的利润达到多少;看一个人在道德上是不是非常高尚,主要看他在地震或者发生其他灾害的时候,他捐款的数量是多少。数量、钱,在好多场合下似乎决定着问题的本质。人们的理性化为单纯的计算和算计,他们已经失去了空灵的人文境界和思想的空间。甚至于在我们这么一个时代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出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向全世界挑战,至少在他的脑子中有一个抽象的理念,那就是过去的骑士生活和骑士的风格,他把它作为理想来追求。哪怕这个理想已经 out of date,已经过时,已经错误,但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作为一个可爱的形象仍然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理念。人们对罗丹的“思想者”塑像感兴趣,他们究竟是对他的什么感兴趣?是对他的思想、对他的沉思,还是对他的健壮的肉体,就是感性的肉体发生兴趣?我为什么这样来提问,因为打开现在的文化刊物和电视荧屏,充斥在荧屏上和刊物版面上的,岂不都是感性的肉体?肉体已经越来越多,现在很少有人谈灵魂、谈思想、谈人文精神、谈人对真理的追求。可是,却有很多人在谈价值、价格,在市场上我的一个点子可以卖多少价格。很少有人以超功利的方式谈论真理、追求真理。在某种意义上,灵魂正在被放逐,感性的肉体正在人们生活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哲学界也有好多人通过弗洛伊德、梅劳庞蒂、尼采等人的学说,在讨论 body,就是身体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要讨论,在这里我只是强调,不能只关注感性的身体,而不考虑人的灵魂、灵魂之追求。实际上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罗马的诞生就是对当时罗马贵族的那种生活方式,肉欲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拨。所以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一种对灵魂、对信念的追求,就是要对抗贵族的穷奢极侈的感性生活。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二种现象。

第三种现象,人们在思想如此贫乏的情况下,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如何去获得诺贝尔奖。这就使人们本身的平庸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其实,谈到诺贝尔奖,我们可以提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获得诺贝尔奖。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打算去获得诺贝尔奖,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去获得呢?人们从早晨到晚上,不断地在念叨“我要诺贝尔奖,我要诺贝尔奖”,这个诺贝尔奖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吗?我的看法是,你真要获得诺

贝尔奖，那就请你忘记诺贝尔奖，退回到你的实验室和书房里面去，把冷板凳坐下去，你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这里说有可能，因为天才大于勤奋，并不是所有的勤奋都能产生一个天才。上海的家长可能给子女们买了几十万架钢琴，但是能出几十万架钢琴家吗？能够成为钢琴家的我估计大概就一两个、两三个，仅此而已。大部分人只能把弹钢琴作为一种文化修养。这就表明了一个人的勤奋并不能够取代他的天赋。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种艰辛的劳动，但是艰辛的劳动并不一定就能够使我们通向成功和天才的道路。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我在这里不再展开。这只是表明，我们要真正获得诺贝尔奖，就要忘记诺贝尔奖，就要用我们的艰苦的劳动和思索去获得这个奖。我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 12 卷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来的两个概念“退隐”与“复出”。所谓“退隐”，就是任何一种伟大的学说，如果要真正地做好，就一定要克服浮躁的情绪，要退回到安静的地方去思考，把它想透了，做出来。所谓“复出”，就是想透以后，把你的理论提出来。我们知道德国诗人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六十年时间；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沉默了十二年、思考了十二年，然后用四五个月的时间把稿子写出来；我们也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四十年，而且也没有完成，第二、第三卷都是由恩格斯替他整理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真要去获得诺贝尔奖不是带着那种浮躁的心理，而是退回到你的实验室和你的工作场所去。中国人也有个说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与其你在河边看见鱼在水里游，你想把它抓上来，你还不如退回去，编织一个渔网，然后再到水里把它打上来。没有辛勤的劳动，没有你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具有的天赋，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能够在世界上有地位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浮躁从来不是通向天才和成功道路的捷径。

第四种现象，就是所谓“繁忙”。现在我们碰到一些学者，一些研究理论文化的人，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总是说 I am very busy，就是非常的忙。但是你在忙什么，我们仔细想下去，所谓 busy 这个字，它是 business 的词根。business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商务”。归根到底他在忙什么，实际上是在忙商务，也就是说在 make money，在赚钱，可能把他应该做的工作扔下来了，把不应该做的工作拿起来了。总之，他用所谓“我非常忙”来逃避自己进行思考。所以有好多东西从表面上来看轰轰烈烈，但在骨子里并没有提供出

真正有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可以说我们是愧对自己的祖先的。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也是中国的古代思想,比如说老庄、孔孟、两程、朱熹、陆王这些古代学者的原创性思想。虽然在当代中国也出了一些学者,但是我觉得在数量以及他们本身的原创性上,可能都会打很大的折扣。所以就目前的局面和实际上我们在思想上的创新而言,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甚至于大到可以用光年来计算。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表明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浮躁的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中,人们怎么可能真正地推进思想文化的发展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大的问题,我讲“模仿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崇尚模仿(imitation)和化妆(make up)的时代。我们先来看模仿,模仿本身是和创造 creation 对立的,是缺乏创意的。人们模仿的思维方法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在大众传媒上经常讲到的跟踪研究。所谓“跟踪研究”也就是跟在人家后面进行研究,所以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英雄气短,因为总不见得你跟踪到别人的前面去。如果你跟踪到别人的前面去,那就是他跟踪你,而不是你跟踪他了。另外,人们有个说法叫“热点分析”,同样是英雄气短,什么叫热点分析,热点分析就是去分析已经炒热的东西,你去参与讨论,这已经属于模仿性的研究,真正原创性的研究就是不研究热点,而是研究冰点。所谓冰点就是没有温度的,或温度很低的,在社会文化中处在边缘化状态的重大问题。通过你的研究使这个冰点转化为热点,这才是原创性的。所以在大众传媒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这样的情形:比如有人翻译了一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结果国内的出版社就出了一大批“奶酪”。人们看了韩国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结果就出了一大批以“野蛮”作为形容词的电影和文学作品。这都表明人们缺乏创意。比如美国的圣弗兰西斯科有一个“硅谷”,浦东就搞了个“药谷”,我在外地还看到什么“光谷”。其实何“谷”之有,既没有山,也没有山谷。总之,到处都充斥着模仿,而模仿是创造的反面,是没有创意的确证。尽管人们缺乏创意,有的时候又想表明自己有创意,于是只能诉诸外观上和表面上的化妆和包装,试图通过表面上的化妆和包装来表明自己如此具有创意。我记得古代的思想家奥古斯丁说过一句名言:“人真是一个深渊。”这句话表明,人的精神世界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无限丰富的。但是,现在我们该怎么来形容当代人呢?也